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新历史观的艰难蜕变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继承谈起

翁寒冰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18)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青年马克思思想逻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对其中马克思新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与思想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继承的思想史脉络出发,研究马克思是如何通过经济学的研究而跃出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框架,却又坚持黑格尔历史观的合逻辑性的信念从而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的意识形态方法。然而在新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的建构中,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视域的局限,使得马克思此时的历史观与其背后的方法论的建构仍具有过渡性质。

关键词:黑格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3-0001-04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的诸多文本、手稿中,“历史”并不是马克思的一个显性的关注点。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当他越走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越深入市民社会的交换—分工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他似乎就离那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越远。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永恒的,而非历史的。当时仅仅站在斯密经济学平台上的马克思很难突破这种视域的局限。但是马克思始终坚信,私有制并不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种对于历史的合逻辑性的信念从何而来?这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信念与马克思在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接触到的唯物主义的“经验历史观”如何嫁接?这是本文将致力于探讨的问题。

一、青年马克思历史观发展脉络中的不变基调:对历史的合逻辑性的信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了彻底清算。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历史。它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它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1]过去马克思致力于批判黑格尔逻辑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特点,这一次,马克思从历史观上入手。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历史”的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形成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在其中针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段落,他肯定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将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并指出黑格尔的历史“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2]而与之相应,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即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阶段而复归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的人”的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历史事实上也只是脱离现实历史的一种哲学逻辑的抽象演绎。但是从其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对于“历史”的定位从来都不仅仅只是在经验历史的堆砌的意义上谈的,他的“历史”是一种蕴含着逻辑必然性的运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一点是受到黑格尔哲学深刻影响的结果。我们知道,黑格尔将其历史哲学定位为“历史的思想的考察”^[3]。黑格尔指出,本来哲学和历史的旨趣是背道而驰的,历史追求史实的真实,而哲学的范围则是与存在无关的观念领域,如果以哲学的方法来治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3]这种治史的方式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转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想在惰性的经验历史的长河中去追寻人类价值的终极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如果从经验的物质实践的考察出发,是无法生长出人类自由的价值内涵的。然而,如果抱着对于理性的绝对信仰,“世界历

收稿日期:2013-03-01

作者简介:翁寒冰(1986—),女,江苏常熟人,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在黑格尔颇具宗教意味的逻辑建构中，“理性”就是唯一的实体，是绝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空洞的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是泛化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正是在其自我展开，也是自我认识的同一的过程中，自由才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历史观中，社会实践的物质性因素被剥离殆尽，因为黑格尔认为有这种物质性因素的制约性存在，人们永远无法获得自由，而唯有将物质实践看作理性精神的载体，看作人类价值的外化，才可以在思想中获得自在自为的自由。虽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脱离现实物质实践的，但是他始终将历史看作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过程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将逻辑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大致框架，这使得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意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是如此，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呢？当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初步解体时，这一“历史”又该如何定位？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观念历史的批判： 对唯心史观的自觉反思

在布鲁塞尔时期对经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对李斯特著作的批判性研究中，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如斯密、萨伊等人理论的抽象性，他们的理论脱离具体的政治历史环境，从而呈现出一种永恒必然性的形态。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马克思意识到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一切理论都是抽象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没有对其根植的市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自觉而沦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而从历史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理论总是根植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理论的这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至此，“历史”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的视野中，这次它不是作为抽象的哲学逻辑的必然性出场，而是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性的考察方法而成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提出了原初历史关系的四因素，它们是一切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来说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为就表现为历史。”^{[1]26}作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前后相继的这种物质生产的历史，是马克思此时理论的基本视域。过去学界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似乎已经关注到社会关系，但是却并没有关注到“历史”，而到了紧接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突然就出现了，其实这一出现并不突然，因为马克思此时对历史的理解仅仅就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它仅仅强调了经济关

系、社会关系的前后相继性，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很好地揭露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却还不能在更深的学理层面上真正超越黑格尔的观念的历史观。

我们不急着指出马克思此时历史观的局限性，而是先看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马克思从此时自己的历史观出发，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合目的性形态进行了分析：“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1]40}于是，明明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推动了历史进程，就变成了观念、意志的有目的的创造行为。这种观念的历史观的现实基础是黑格尔他们从没有正面回应的，反过来说，正是忽略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客观制约性，使得黑格尔的历史观永远只能在精神世界中解决问题。而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50}我们知道，黑格尔恰恰就是把存在问题消解为价值问题，而超越了康德理论的主客两分架构，被黑格尔认为是偶性的毫无意义的物质性因素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剔除掉了^[4]，因此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市民社会的种种矛盾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伦理层面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精神的运动过程而自动扬弃的。他将物、将他人消解在与我的关系中，于是以理性、精神形态出现的“我”成为了绝对的主体，成为逻辑运动的唯一主体，于是我便在与物和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了解脱和自由的可能性。但是黑格尔忽略了一点，当“我”与“物”不是处在思维中的抽象的主客体关系中，而是处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时，“物”与“我”的关系就成为了现实的生产关系，他人与我的关系就成为了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我”的一切行动和观念等都具有先在的外在必然性。它是无法通过转化为我的对象性存在这种外化和外化的思辨扬弃所消灭的。

三、马克思新历史观的建构：实证化的 历史结构分析与哲学批判的外在嫁接

黑格尔的历史观通过将经验历史的素材填补进哲学逻辑的体系中，从而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哲学性统一，使得历史呈现为朝向最终自由目的的具有

能动的自我超越功能的形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就是受到这种历史观的深刻影响的,但是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思路逐渐脱离了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愈益深入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在方法论上,经济学的实证思路显然对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创立产生了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新历史观的阐述就具有明显的实证意味。

在这样一种新历史观中,马克思对于理解历史的层次有着初步划分。处于最基础层面的是物质生产活动层面,其主要指标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这几个概念。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在这一文本的不同地方有过不同的界定,首先,在哲学一般的抽象层面讲,它指人们共同活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们所创造的,却在现实中成为奴役人们的客观力量。其次,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来看,它以劳动工具的不同形态,分工的不同程度为指标,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总的来说,马克思此时对于生产力的界定是模糊的,它总体上指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边界不清。它们总体上指示了生产过程中的怎样生产的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这是对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指出的“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就是一种矛盾”^[5]中劳动组织形式^①的概念的进一步明晰化。在这一最为基础的层面之上,是“交往形式”这一市民社会表层关系的概念。它指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分配、社会分工—交换等等关系的形态。有时,马克思恩格斯也用“社会状况”、“社会关系”、“所有制”等概念来笼统指示这一层面。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需要的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家眼中的“分工—交换”的看不见的手,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立足批判的充满私利的异化社会。而在这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是国家,是意识的各种不同产物和形式。粗看起来,这种历史结构的理解方式过于实证,但是马克思紧紧抓住了一点作为历史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动力,那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

其实从马克思对于历史结构的划分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本来属于不同的层面,何以构成矛盾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所属的这两个层面的界划尚不清晰。马克思并不是在狭义的劳动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理解生产力,而是从分工—交换的表层经济关系中来理解生产力。因此,马克思将分工看作指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一分工概念尤其模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

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1]138}从大篇幅的对社会分工的讨论中,可见,他此时的理论关注点还只是停留在社会活动的分工阶段,也即交换层面的分工。当然,他也无意中触及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并且在谈到“生产方式”概念时,模糊地用了“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的表述。这显然是要去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机制与关系。可惜马克思在劳动过程中除了看到劳动者的畸形状态,并没有发现其他。他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他发现劳动过程内部的关系和矛盾。

这样看来,马克思此时的生产力概念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确实只是停留在分工—交换的表层,它与交往形式在实质上是处于同一理论层面的,因此有构成矛盾的可能性。交往形式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阶段^{[1]112},分工所导致的生产的普遍化与私有制的交往形式已经不再兼容。“这些生产力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1]114}马克思何出此言?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由于分工,使得人们共同活动的力量采取“物象”的形态与人相分离。在私有制中,只有作为私有者,才能对物象重新占有,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是与生产力相分离的。这些失去其对象性存在的人成为抽象的个人。而个人与生产力的唯一联系则是劳动,但是在私有制下劳动却以摧残生命的形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大工业要求最普遍的交往和联合,然而私有制却使得人们相互分离,因此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的总和,才能使物役性的劳动与自主活动重新统一起来。可见,他用私有制下的分工和分离理解生产力的破坏性力量,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的颠覆的逻辑,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一种类似于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的“必要性”,而非本质的客观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依然拖着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小尾巴。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由于其价值维度的“恶”,而是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力和购买力之间的客观矛盾等都会产生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而马克思此时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他此时理解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根本无法构成内在矛盾。因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的表层,是人人平等的,而唯有在更为基础的生产层面,才会构

^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14页上将劳动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同义使用,可见马克思此时对劳动组织形式、生产关系也是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的,它与经济关系表层的交往形式界限也不清。

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性矛盾。^[6]

可见,马克思从来没有满足于经验实证的历史观,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层面的矛盾来彰显历史本身的能动性,这一点显然是深刻受到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但是在马克思这一新历史观的建构中,由于他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使得他暂时无法真正完成他的理论目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必须依靠哲学外在批判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性结局,而无法真正从历史本身中寻找其本质性的内在超越力量。仅仅将理论落在在表征宽泛的经济关系的物质生产层面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还远远不够,只有深入经济学的研究,深入经济关系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狭义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在僵死的经验历史中找到承载人文意蕴的真正落脚点。

四、历史观的方法论批判:

对黑格尔式的“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精神作为历史唯一的主体,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自我展开、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实现其最初萌芽时期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在这一哲学逻辑的隐喻中,历史获得了自我超越的能动力量。因此一切现实的历史阶段都无法逃脱被扬弃的命运,而朝着合理性的目的向前发展。而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观虽然展示了历史本身的能动性,但是它并不是依托于历史自身矛盾运动的展开,而是依托为某种外在的尺度,即观念的逻辑而被描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逻辑,而是黑格尔的意识所创造的脱离现实实践的神秘逻辑。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哲学起点处的抽象一开始就是脱离现实历史的抽象,因此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仅仅是在思维范围内的逻辑运动,而对于现实矛盾的扬弃,现实历史的自我超越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开始探索新哲学的抽象方法:“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1]33}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于从历史结果中抽象出的历史发展逻辑的阐述是一种无前提的抽象,它不再具有任何现实历史意义,而沦为纯粹的哲学思辨创造。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作为人脑的生理机能,并不具有再创造历史的资格,而仅仅只能整理历史资料的逻辑层次关系以备进行进一步的现实考察。抽象是很简单的,抽象到具体的扬弃历史的过程就更简单了,它不过是思维中的自我运动而已,但真正的困难在于阐述这些经过抽

象的逻辑方法整理过的历史资料。一定要将它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还原到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活动中,才能真正解决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逻辑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正确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法,并且它必须始终基于现实历史的条件和前提,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如果将这种对历史的考察方法混同于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甚至变身为历史本身的创造性主体,那就是一种僭越了,这就沦为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点了。虽然马克思此时对于黑格尔观念历史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认识方法的提炼与运用还没有完全成熟。

概观《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手稿写作的总体方法,马克思倒是对这个现实的前提依赖得过于紧密,甚至有实证化的倾向。历史被界定为以分工和所有制发展为线索的前后相继的各个阶段,其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被安排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经验层面的矛盾之上。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这个一切因素都“具体”化的历史终点上,历史被迫在马克思异化批判中完成了自我超越。马克思对于这一历史的描述可以被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抽象出的表层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发展的经验描述,其二是对抽象出的历史本质层面的经济矛盾运动逻辑的哲学揭示。而事实上这两个部分是两种考察方法的叠加,而非一种新的科学认识论的产物。并且事实上,这两种考察方法都残留着旧哲学的方法框架。其一不过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其二还是不免带有思辨哲学的印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与历史逻辑的哲学提炼如何统一?僵死的历史资料如何真正具有能动的人文意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初步尝试是意义重大的,也是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理论空间的。

参考文献:

- [1] 广松涉.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 彭曦,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 [3]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4]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5.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